

“教材循环”该推行还是缓行？

核心提示

在倡导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的今天,人们日益认识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善举,教材循环这一政策因此应运而生。教育部决定从2008年春天开始,在农村中小学建立部分科目免费教科书循环使用制度,教科书只对学校进行配备,由学生在本学期使用,学期结束时归还学校,供下一级学生使用。

推行循环教材,中国并非首创。然而,这样一项看起来利国利民政策,在中国土地上却遭遇了“水土不服”。不仅受到部分家长、学校质疑,在广大农村基层遭遇“执行难”,甚至在今年的两会期间,还有代表、委员提出教材循环应该缓行。

到底该努力前行,还是该暂缓实行,教材循环似乎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教材循环,推行过程遭遇瓶颈

从今年春季开始,安徽省将初中小学9本教科书纳入循环使用范围。免费教科书作为学校装备,由学校集中管理,学生免费借用,不属学生个人所有。9本书包括小学《科学》、《音乐》、《美术》、《艺术》、《信息技术》,初中为《音乐》、《美术》、《艺术》、《信息技术》。同时,考虑到教材的实际损耗,根据各地循环使用教科书的版本分布情况,及上年实际学生数,每年按20%的比例进行补充和更新。针对回收的教科书,学校也将逐班、逐科、逐本进行检查,对丢失或破损的教科书及时登记、修补、核销。学校必须对教科书定期消毒,确保书籍的卫生安全。

可以看出,为了教材循环的顺利推行,相关的制度设计也正朝着完善细节与人性化的方向努力,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循环教材政策在基层农村难以推行。

在安徽利辛县阚疃中学,该校虽然知道教材循环政策要求,但是在实际教学实践中,并没有严格执行。该校副校长任锋指出:“循环教材想法很好,但是真的执行起来很困难。一方面,学生的保护意识很差,教材用三年,很多都用烂了,有的都不知道扔哪里了,三年后循环很难实现。而另一方面,循环教材要求的消毒措施在基层难以保证。教材收上来其实就应该进行消毒处理,但是怎么消毒、消毒方式等问题,都没有明确的实施细则。”

任锋表示,利辛现在正在实行小学五改六,目前阚疃中学初中只有600多人,人数还不太多。但是下学期五改六结束之后,一个年级就会增加到五六百人。“教材那么多,收上来堆放在哪里?如果没有消毒的话,集中起来存放更容易交叉感染。音、体、美等教学教材不发放

给学生,只在上课的时候派发给学生,上完课就收回、消毒,这就意味着需要专人来保管、处理、存放这些教材。我们学校是县直属中学,



河南社旗县赊店镇中心小学的学生在用循环教科书学习。



河南淇县前进小学三(3)班学生李嘉嘉和同学们领到免费循环使用的教科书。

师资力量还算好的,都不可能做到,更不要说师资力量严重缺乏的农村中小学,任课老师都不全,更不要说专门的保管员、消毒员。我们一个学校才20几个班,利辛很多农村中学一个班就有百来号人,人数众多,教科书数量大,操作起来更困难。”

教材循环饱受争议 是“前进”还是“后退”？

循环教材实行以后,各方褒贬不一。全国政协委员、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认为,从倡导环保、厉行节约角度出发,教材循环使用有着积极意义,国外也有这方面的成功经验。

单以人口论,中国是世界上第一教育大国,目前全国在校中小学生约2亿,按每个学生一年两学期使用课本15册计算,每年消耗教材30亿册左右,每年印制30亿册教科书需要消耗纸张55万吨,为此要砍伐1100多万棵树木;而每本书按15元计价,需要投入450亿元,其中的节约潜力巨大。目前,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家,课本回收使用已经形成制度。在美国,一本教材至少要供8个学生使用。从环保和财政资金的节约角度来看,实行教材循环使用的好处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一位学生家长告诉记者,循环教材制度的初衷很好。环保意识在全社会的推广就应该从小培养,教材循环使用不但能够培养孩子的节约资源意识,同时也能潜移默化地培养孩子的责任意识以及社会公德意识。虽然这项政策在推行之初会遇到一些问题,他希望通过学校与社会应该多想办法将好的政策推广下去。同时对待这样一个全新的制度学校应加强对学生的引导与教育。

然而,反对循环教材的声音也不在少数。一些家长担心,教材集中回收、反复使用,如细菌消毒不彻底,会不会影响学生身体健康;教材统一管理,课前预习、课堂练习、课后复习等有效的学习程序会不会受到影响。

按照规定,循环教材要使用三年,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课本的保管成为一个难题。为了保证课本的完好,有些中小学做出规定:新发课本一个字都不能写,否则双倍罚款。学生在循环使用教科书时,因为不能在上面写字填写内容。比如《科学》,里面就有一些实验报告,同学们或者把报告填写部分抄下来,或者自己复印,有些学生家长干脆自己掏钱另购一套教材。如此一来教材循环反而为学生和家长带来新的负担。

此外,还有人质疑在目前的教材纸张和印刷的质量下,循环教材是否能保证3年的使用期;副科循环主科不循环,会不会加深学生主副科区分的概念等。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出版集团总裁王亚非和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不约而同地对教材循环制度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在目前条件下,教材循环工作的推广时机并未成熟,国家有关方面应该广泛调查、慎重研究,暂缓实行。

“事实上,从经济效益上看,循环使用的教科书只有9种,而且都是音乐、美术之类所谓‘副科’,跟语文、数学、英语之类的‘主科’比起来,量很小,对于资源节约来说意义不大;而在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全部免费,也不存在减轻家长、学生经济负担的问题。与此同时,循环教材的实行需要一系列复杂的发放、回收程序,从一定程度上说,反而增加了人力资源的消耗。”安徽出版集团总裁王亚非对记者说。

北京市仁爱教育研究所所长赵勇也指出,“国外使用的循环教材制作非常精良,耐磨性非常好,不容易损坏。但是国内目前的教材普遍都达不到这个标准。而且如果按照国外循环教材的标准来生产,成本也非常高。”



杭州天成教育集团黎明校区小学6年级的孩子们在展示他们使用的“循环课本”。

教材循环政策亟待完善

教材循环制度在饱受争议的背景下还是努力前行,目前教材循环已在全国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实行,从争议热点来看,大多数人并没有因为现实遭遇的种种难题而否定制度设定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毋庸置疑,无论从资源节约和学生公德意识的培养上,教材循环政策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优势而值得期待。

然而,其实际推行过程中遭遇的现实难题,譬如消毒问题、教材质量问题、学生学习习惯问题等等同样不容忽视。虽然教材循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有多年的成功推广经验,但由于国外的学习环境、教育背景等与我国存在着较大差异,循环教材在我国的推广还需要完善细节,积累经验。只有克服现实运行中遇到的难题,才能使得教材循环朝着其初衷方向顺利推进。

一位学生家长告诉记者,推行教材循环是一项意义深远的举措,和大多数家长一样,他表示理解与赞同。但是从实际推广上来看,这项政策确实还有很多“配套”工作有待完善。他期待着循环教材能真正实现良性循环。

鲁迅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归根结底,医治教材循环“水土不服”的良药还在于教育理念的更新和对具体执行环节的创新。

一项科学的政策从制定到推广,其间要历经若干次的信息反馈与制度修正。作为一项备受期待的政策,教材循环制度的良性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亟需学校、家庭、教育、出版部门等多方面积极配合,努力从中摸索探讨经验,不断在相关技术手段上加以细化和完备,唯有如此,才能把这一项利民的政策真正落在实处。

据新华社

高官定量接待 可否倒逼基层信访畅通

要想让群众来访反映的问题得到真正解决,官员接待量化用意良好,但并非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唯有把基层接待的工作真正做到位,才能让信访问题不至于导致局部地区的不安。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文指出,市(地、州、盟)党委和政府领导干部,一般每季度安排一天时间接待群众来访。县(市、区、旗)党委书记、县(市、区、旗)长一般每月安排一天时间接待群众来访。乡镇(街道)领导干部要随时接待群众来访。(《南方都市报》4月15日)

文件对一定职位的官员接待次数予以量化的规定,其根本目的,就是旨在通过官员定期接待,及时发现一些在基层接待中所未能消解的问题,及时发现一些由于信访渠道不畅而引发的事故隐患。从制度设计的角度而言,官员接待量化的量化是一个进步。

其实,对于官员接待的量化问题,早就有地区进行了尝试。自从争议官员仇和赴昆明担任市委书记之后,便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公开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与联系方式等等,都引起了公众热议。领导干部联系方式的透明化,也同样是便于公众通过正当途径反映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化解由于信访路径的不畅而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的一种方式。

但对官员接待的影响,也不宜过于高估。犹记得,在评价仇和这一系列的新政产生的积极影响时,有媒体好事,仅依靠领导干部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昆明市的所有问题却不能仅指望仇和一人去亲自解决。这话,若是套用官员定期接待的新闻上,则应是固然官员定期接待能解决平时可能解决不了的许多难题,但也不能指望官员的接待就能将现行信访渠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全部化解。

别的不说,级别越高的高官,其一年接待的次数越少,以地市级高官而言,若是按照规定,其每年的接待时间一共是四天,四天就算是满打满算10小时接待,也不过只能见面几百名群众。显然即使是高官的话比基层信访工作者更有力度,他们所能解决的问题也是非常少的,顶多不过是解决一些平时根本解决不了的难题。这一点,昆明市高官的接待已经足以说明问题。

所以,要想让群众来访反映的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官员接待量化的规定用意良好,但却并非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唯有把基层接待的工作真正做到位,使得群众来访的问题绝大多数能在基层解决掉,基层解决为主,高层解决为辅,只有在信访领域中培养起这样的观念与意识,才能把信访的问题不至于导致局部地区的不安。

如果基层信访渠道始终处于不畅的状态,一旦演变成由高官出面解决的地步时,往往也是矛盾一触即发之时,冤案事件已经成为信访渠道不畅可导出恶果的一个“典型”。是以,我们诚意期望,两办出台的这三个文件能以官员接待量化来倒逼基层信访渠道的畅通,笔者以为,这方是三个文件的终极目的。 王毅

孩子们不喜欢的课竟然是音乐

当今因为学习负担重,许多孩子的童年不再美好,而是呈现“童年恐慌”倾向。其实,还有一个倾向也值得警惕:“情感荒漠化”。

据调查发现,小学生最不喜欢的课居然是音乐、美术和劳动,初中生最不喜欢的课居然包括音乐和语文。半数以上中小学生学习超时、睡眠不足。在沉重的压力之下,他们接触的课外书大为减少。在课外休息时间,父母们最希望孩子读的书依旧是教学参考书。可怜的父母们不约而同念起一句口头禅:“孩子,只要你把学习搞好了,别的什么都不管!”

长此以往,青少年被迫疏远文学艺术和丰富的生活,审美素养、道德修养、创新能力都会受到限制,以乖戾、偏执、自私、冷漠等为特征的情感荒漠化倾向,终将出现。

情感荒漠化,是素质教育的“天敌”。我们都在强调推进素质教育,然而,还有很多人表示不清楚什么是素质,似乎永远也说不清。其实,素质并不那么难以理解。教育界认为人的素质包括身体心理、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劳动技能、艺术审美等五个方面的综合素质。

一位伟人说得更为简洁:当你把学过的东西忘掉了,剩下的就是素质。也就是说,忘不掉的是素质。那么,什么是忘不掉的呢?根据人类的普遍经验,兴趣、习惯、思维方式是忘不掉的,而更忘不掉的,是情感,是对美的追求。显然,这些忘不掉的素质正是与文学艺术及丰富的生活体验密切相关。

在研究中发现:对少年儿童帮助最大的媒介内容是儿童文学,其次是知识

类读物;凡是爱读儿童文学的学生,道德状况得分较高,而道德状况得分较高的学生,也往往爱读儿童文学。不仅如此,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创新精神与实践创新能力,而许多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创新的基础是审美。

警惕“情感荒漠化”,加强审美教育和情感教育,意义重大。教育是人的解放,首先是心灵的解放。真正的教育永远是人的灵魂的事业,真正的教师首先是人格之师,其后才是知识之师。任何一个家庭,任何一所学校,都不是单纯的职业或技能培训中心。审美与情感才是教育的第一块基石。

教育家斯霞说:“智育不好是次品,体育不好是废品,德育不好是危险品。”对此,父母和教师当深思。

张崇星



漫画:新闻监督护照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日前正式聘请14名记者为特约新闻观察员,并向他们颁发由该院院长许前飞签发的“新闻监督护照”。今后,这14名记者在全省法院系统采访时,将享有更大的便利。(4月14日《人民日报》)

云南法院发“护照”,记者担任观察员。全省系统去采访,可保畅通无阻。报道新闻是本分,何苦要设这门槛?顶着头衔去采访,还有多少自主权? 唐春成 漫画 张洪 配诗

中国隐形富豪之多耐人寻味

《2009胡润财富报告》于4月15日发布,报告称,全国有82.5万位千万富豪和5.1万亿亿万富豪,每1万人中有6人是千万富豪。尽管报告甫一发布就有人质疑“每1万人中有6人是千万富豪”的结论是否准确。这位年轻的英国人给出的庞大富豪数量似乎与公众的直觉不符。对此,胡润自己的解释是,在综合考虑了微观与宏观因素后,该数据囊括了所谓的“隐形富豪”,由此才会使得数据之高超乎想象很多。

“隐形富豪”的说法耐人寻味,顾名思义,“隐形富豪”就是不为多数公众所熟知的富翁。那么,首要的问题是,如此大规模的千万富豪为何偏偏

能“大隐于市”呢?

《报告》称,中国的千万富豪主要包括四类人群,即商人、高收入人士、炒房者和职业股民。实际上,这样的结构划分极为不合理,它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商人和高收入人士”表明了富豪的财富来源,但是所谓的“炒房者和股民”却模糊了财富来源,其中的奥妙值得玩味。其一,炒房和炒股只是投资渠道,而千万富豪们巨额投资资金来自哪里,也就是说他们最初的财富积累途径是什么,这一点被“炒房者和股民”说法所掩盖;其二,以中国投机市场的暴涨暴跌状况看,“十个投资者亏七个、平两个、赚一个”已经成为定律,而那些依靠

炒楼和炒股成就千万财富者,却为何能够历经惨烈的金融危机而不倒,其间又有什么秘诀呢?显然,较之于海外市场的富豪信息透明,这样的千万富豪榜只会让人们更加迷惑。

一个匪夷所思的千万富豪榜,暴露出深刻的社会问题。无须讳言,当下的中国社会存在一定程度的“仇富心理”,这样的心态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反仇富心态的根源,假如每个富豪的财富都能够一笔笔地说得清楚明白,每个公民只要勤奋努力就能成为千万富翁的平等机会,那么,“隐形富豪”自当大白于天下,所谓的“仇富心理”自然也就随之而消亡。 马红

公安部门内部监控摄像头有还是没有

小沈阳的经典台词“有还是没有”用在一些公安部门对摄像头的选择性应用上倒是比较贴切,只不过在《不差钱》中是餐厅服务员问顾客,而在公安部门,一般是内部保安或摄像头管理人员“领导”,其潜台词是“想要有还是没有?”

13日,关于“刑讯逼供”的新闻又使这个老话题有了新的关注点。一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指出中国在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依法保障人身权利,“严禁刑讯逼供”。(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联想到今年发生的陕西丹凤县公安局“躲猫猫”、江西九江看守所“做噩梦”、福州市第二看守所嫌犯睡梦中“床上摔下”等几起涉嫌或被证实的嫌犯或在押人被牢头狱霸殴打致死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点,当质疑初起,在关键的时间、关键的地点,摄像头都出了问题——要么是“摄像头坏了”,要么是“电脑硬盘故障”,要么是镜头镜头“始有终无”,剩下的是“这个可以有”。这种不受约束的信息垄断,暴露了管理制度的漏洞,直接导致“刑讯逼供”或“牢头狱霸”的产生。

制度的漏洞不等于制度的缺位,事实上公安部门在严禁“刑讯逼供”或“牢头狱霸”的问题上,处罚是严厉的,态度是坚决的,文件是明确的。但为什么这两种现象屡禁不止?显然不在于制度的有与无,而在于与细的问题。具体地说,在于制度能不能管住摄像头。

既然摄像头是解决“刑讯逼供”或“牢头狱霸”监管及取证的关键,何不从制度上严防死守这一关?比如将制度进行细化,若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对公安部门相关责任人予以开除或撤职:1.在设有摄像设施的地点审讯;2.审讯室或监舍没有安装摄像头,或摄像头损坏而没有及时修理;3.摄像头停运或检修时间不得超过一天,其间的审讯须有律师在场,同时监舍要处于人工监控视野之内;4.在有争议的案件中,不能正常提供或完整提供摄像资料;5.没有专人负责摄像设备的实时操作、监控与管理;6.摄像资料没有保持全天候的完整性和连续性;7.审讯开始摄像人员没有同时就位并签字确认设备正常,审讯结束,没有拷贝一份,由参与审讯人确认存档;8.摄像资料经过移花接木和剪裁的技术处理,有作假嫌疑的;9.排除国家机密,没有理由拒绝家属和律师调看或复制摄像资料。

笔者认为,如果将“严禁”的制度细化为以上具体的指引,首先将“摄像头”管住,就不会让谎言找到借口,就不会出现“有还是没有”这样的疑问。“刑讯逼供”或“牢头狱霸”也就有望解决。 方礼纲